

命性的变化”^[1]。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唐·塔普斯科特相关著作《数字经济》的问世，使数字经济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2]原美国经济事务商业部副部长 Robert J. Shapiro（1999）在美国商务部报告中指出，1997 年曾有预测分析认为，因特网将在 2000 年为零售业创造高达 70 亿美元的价值，但事实上在 1998 年几乎就超越了该水平的 50%。^[3]美国的数字经济时代，早在 20 世纪末就已变为现实。^[4]那么数字经济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杨占生、杨颜瑾（2001）在论述数字经济内涵时指出，“由工业革命的经济学的完成向信息革命的经济学的转化成为可能”^[5]。客观地讲，其正是在各个领域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基于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转型的过程而衍生的新兴经济模式。根据《中国林业信息化发展报告 2018》的数据显示^{[6]459}（参见表 1），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以 10 万亿美元的额度领先全球，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态势，主要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张、融合特征显著、由消费向生产领域拓展、福利型数字经济表现突出、影响社会治理等多方面。以中国数字经济为例，2016 年的同比增长速度位于全球较高水平，高达 18.9%，总量也达 22.6 万亿元，中国数字经济对 GDP 的贡献率在 2016 年为 58.7%，其在 GDP 中的占比高达 30.3%。比 2015 年度提升了 2.8%，并在 2017 年创造了 4.9 万亿元的分享经济交易规模，涵盖诸多领域的共享发展和新兴业态。^{[6]460}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数字经济具有相对突出的特点——开放性。倘若现代市场经济失去开放性的重要特征，基于物联网、电子商务和全球贸易而衍生的数字经济根本就无从谈起。接下来将做出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客观分析，力争探明开放型经济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真实景象，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可供参考的系统方略。

表1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态势	表现	备注
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	在GDP中的占比增速较快	美国已超10万亿美元位居首位，在GDP中的占比超58%
融合型数字经济主导地位加强	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不断增长	主要国家融合型数字经济占比高于70%，少数国家大约90%
从消费到生产领域的拓展	出现许多新兴模式和新兴业态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信息通信服务业稳定发展	基础型数字经济增速趋缓	在GDP中的占比相对降低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速	和经济社会多方融合速度加快	有利于技术创新、社会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
福利型数字经济成为主体	分享经济具有代表性	
对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包容性发展和持续性发展等价值明显	数字经济在各国战略地位提高	
对经济社会治理模式影响深远	从政府监管到多元共治的转向	

在全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全球市场经济及其发展基础为数字经济做过的铺垫却是由来已久的。数字经济的演化进程，可以基本概括为三个重要的步骤，正是在这三个步骤的层层逼近中，数字经济经历了从产生、发展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进程。客观地讲，数字经济的这些步骤，展现了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演进逻辑。

（一）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效应及其对全球市场的开拓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有效开拓，数字经济有了得以滋生的土壤和内外环境，以及确保自身有效生存和深化发展的原始基础和现实条件。我们暂且不去谈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行为动机的正义性，仅就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贸易市场的开拓而言，资产阶级确实有所行动并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果。资产阶级依靠工业革命、商品输出和殖民化策略等手段，极大程度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的生产力，使人类传统和滞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关系都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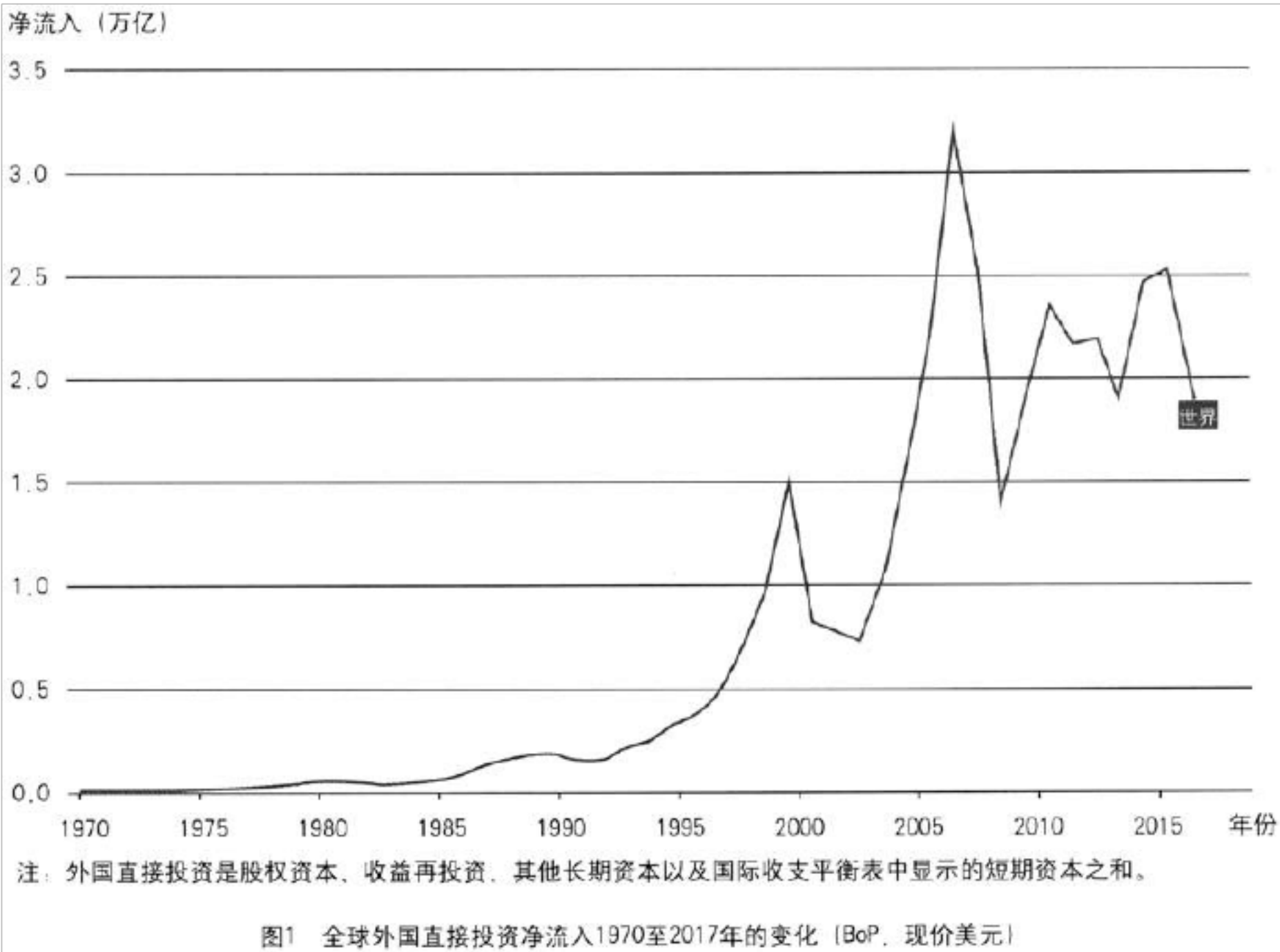
基本上实现了对其前置社会经济形态——封建社会的顽强反抗和卓越胜利。在促进生产力水平持续增长和优化的进程中，资本武器以其强大的威力开启了全球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命运逐渐变得休戚相关，并在彼此的深刻影响中发展到如今。一方面，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影响下，人类发明了诸多可以极大提升生产效率和变革传统生产方式的工具或技术，其又反过来有效地推进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形成了物质技术层面的良性发展和循环，为数字经济的前期演化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方面持续取得实效发展的同时，对全球市场的开拓也与之相伴相随且从未中断，一直延伸到如今的全球化进程。显然，全球市场的有效开拓和全球化进程的纵深发展，作为看似无形却又显而易见的演进趋势，可以被理解为早期数字经济发展的软件基础。

（二）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全球资本的加速流动

资本力量的加速扩张及其在全球开放型经济环境中的盘踞，使得数字经济有了深化发展的动力条件、有效手段和良好渠道。总体而言，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当下主流的经济模式都是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尽管各国家和地区在赋予市场自主性的程度上差异明显，在国民经济管控和微观主体治理等层面的操作口径也不尽相同，但各国家和地区对市场作用认同的共识却是有目共睹的。譬如，中国当下也已完成从长期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7]到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8]的重大转变。据世界银行的数据^[9]（参见图 1），随着世界经济不断深化和发展，全球 1970 至 2017 年外国

并在 年后达到顶峰的 3

万亿美元以上，表明该历史时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活跃程度是持续加强的。客观地讲，资本虽然是资本主义的衍生物，但其本身的客观性质和原始本能在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中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随着开放型经济体制在全球不断得到应用，资本力量越过国内不同行政地区乃至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边界，以连锁经营、跨国公司和内外合资等手段，逐渐开启了近乎野蛮的生长历程。因此，资本扩张及其野蛮生长，虽带来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却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动力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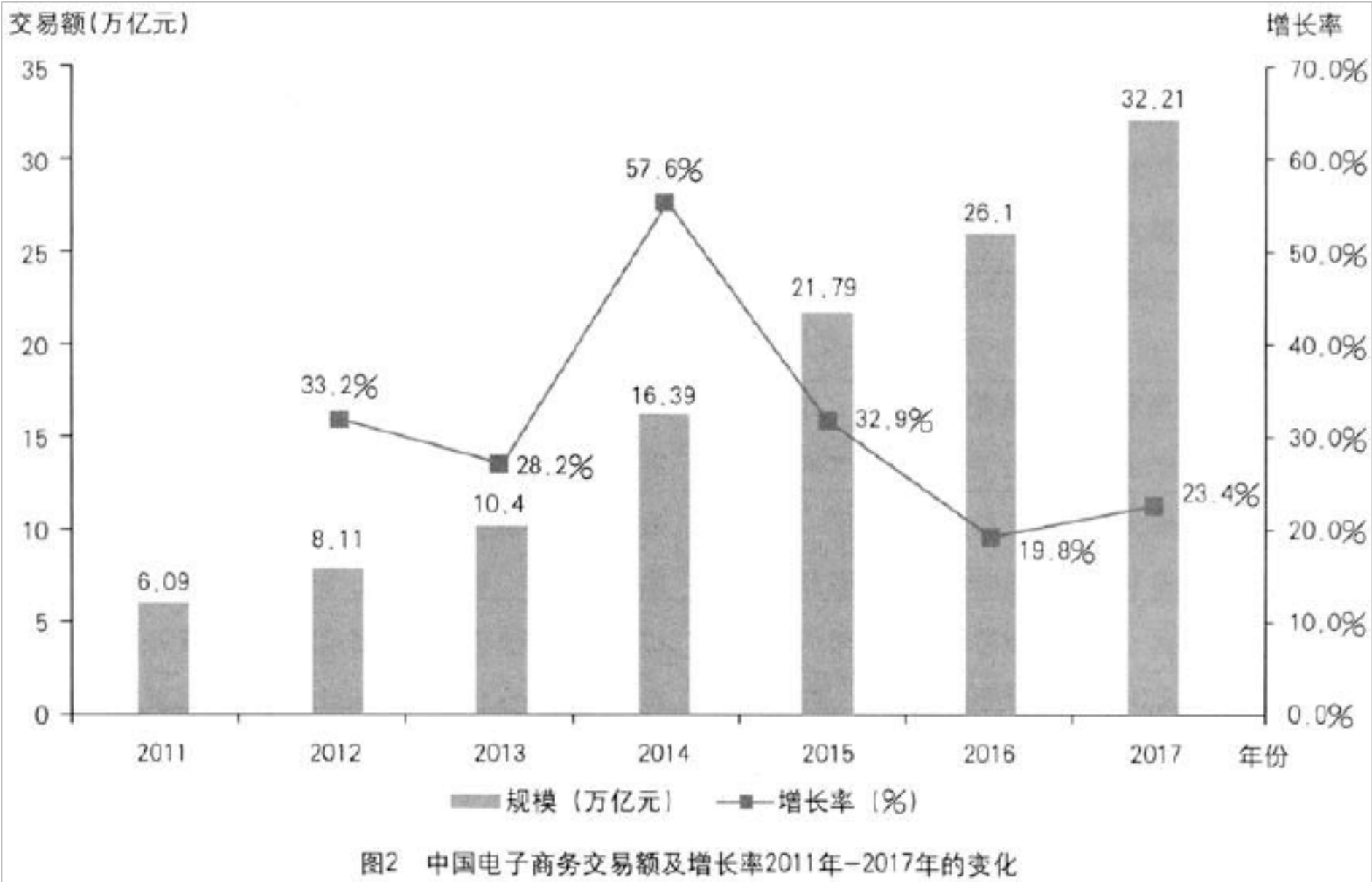
(三) 跨区电商、信用经济与全球贸易新体系的系统发展

是数字经济生成和发展及其具体形式中三个很重要的环节。

首先，在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不断实现革新式进步的基础上，跨区贸易行业实现了向跨区“电商”产业的颠覆性发展。跨区贸易是由来已久的，但跨区电商却是在传统跨区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一般而言，传统跨区贸易以线下订货、线下运输和线下售卖为主要手段，来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跨区贸易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独特优势，实现了向跨区电商的有效转型。正是因为受到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积极推动，国内和国际商品的交易环节开始从线下转移到电视、手机和电脑等技术终端，并逐渐演变形成面向全球的虚拟商品市场，跨区电商因此也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当然，随着跨区电商的深化和发展，与其配套的产业服务和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有效的激励，其中就包括物联网、无线通信和在线支付等关键领域的核心突破。以上领域的进步和跨区电商的发展始终是彼此依存的，同时也在长期发展中相互激励。

其次，跨区电商的新兴发展模式催生了信用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传统的跨区贸易，建立在“以钱易货”的结算方式基础之上，而跨区电商则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联网和在线支付职能之上。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新出现的事物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安全性。我们并不否认其中客观存在的风险，但是我们更加愿意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实上我们的开发者或监管主体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规避和防范了这些风险。必须明确的是，无论开发者或监管主体对此做出何种程度的干预，都不能否认跨区电商是建立在信用机制之上的客观事实。在跨区电商发展的整个历程中，位于商品交易两个技术终端的售卖者（同时也是

和购买者之间必须具有极高的信用，同时对作为连接两者的运输者（物流）也有相当的信用要求。基于此，可将依托于跨区电商产业发展而生成的经济模式理解为信用经济。据《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10]（参见图2），2011-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总体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增长速度虽然并非逐年攀升，但也基本位于20%左右，其中2016年增速虽是最低水平但也达到19.8%，而2014年增速甚至高达57.6%，2017年我国就创造了32.21万亿元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最后，在跨区电商和信用经济的持续作用下，全球贸易新体系的形成则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搭好了框架。随着资本的加速流动、全球市场的持续开拓和信用经济的有效发展，跨区电商产业逐渐发展成为向全球出售商品的巨型市场，许多大型生产厂商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在某地设立生产或发货基地，它们纷纷

经济的发展现状和世界商品交易市场的原始结构，造就了全球贸易发展的新兴体系。至此，各种必要性条件都已基本具备，并有效地维持在全球贸易新体系的框架中，数字经济生成、发展和演化的全部历程已经清晰可见。

二、当代数字经济的发展动因

对数字经济演化逻辑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其自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其演化逻辑背后的发展动因同样感到困惑。经过分析后我们发现，数字经济的生成和发展动因是纷繁复杂的，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技术统治生产、供需市场的精细化、产权交易更加便利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等多个方面。

（一）技术统治生产导致商品经济发展趋向“数字化”

在技术水平持续优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中，商品生产模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从经济史视角来看，正是由于英国领导的工业革命及其引致的技术水平增长，人类社会的发展才得以进入“快车道”。客观地讲，技术精进对人类社会及其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其负面作用也同样不可否认，鉴于主题及篇幅等原因在此处不做深入分析。我们所要详细论述的，是技术对物质资料生产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促进现代商品经济数字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不仅涵盖了由原材料和二次加工原材料所生产的具体物质产品，还包括由劳动力自身提供的无形产品服务。由于技术水平的持续

费等环节，进而整个社会再生产都被技术统治。在现代商品经济中，生产厂商为不断强化自身在惨烈市场竞争中的战略优势，势必充分依靠不断发展的技术来提高效益。在这种形势下，为追逐更高的生产利润，各大厂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会变得尤为突出，物质和服务等产品的生产主体被技术所束缚，技术控制了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环节；在交换环节中，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展，资金的支付和商品的交换也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譬如，在现代物流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日渐趋低的条件下，诸多消费者已经完全依赖上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在线采购体验，导致现代商品经济对技术的依赖性也愈发增强，技术再次统治了社会生产的交换和消费环节；从某种意义来讲，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分配，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物质产品和其他服务在相关主体中的占有份额问题。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推进下，各种统计模型和数据分析大行其道，能源、资源和产品的分配也有了所谓的科学依据。譬如，在经济社会治理中，各种政策和资源的分配可能会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倾斜于数据表现相对弱势的地方。基于此，社会生产中的分配环节也被技术所统治。

（二）市场供需的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人们的各种需求与之前的历史时期相比较，也有了更多的复杂性，并显得更加高级，同时也在朝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在技术不断精进的新时代，人们不再简单地追求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逐渐期待享受到更好的物质文化条件，甚至于部分消费者长期沉溺于超级刺激的身心活动，这些改变在潜移默化中造就

自身的生产过程中会逐渐展现出既定的倾向，以迎合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精细化需求。数字经济本身具有的高效便捷等特点，决定了其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效地发挥战略优势，进而满足精细化市场供需持续发展的需要。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数字经济理解为精细化市场供需催生的结果，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也对市场供需精细化的实现带来影响。

（三）产权交易的壁垒消减及其价值彰显

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健全和产权交易壁垒的消减，促进了全球贸易和跨区电商的有效发展，为推进数字经济创造了充分的前提条件。产权制度虽是私有化的产物，但其在当代不同经济形态的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随着开放型经济和现代市场体制的不断深化，产权制度也逐渐走过了极不寻常的革新和演进历程，为现代开放型经济奠定了厚重的发展基础。基于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贸易交易体制也实现了深刻的发展变迁，为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在产权制度的维系下，现代商品经济中产品交换的活力得到强化，给实体经济和跨区电商的发展都带来极大的便利；产权制度有效完善的表现有很多方面，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产权交易壁垒在全球范围内的消减，以及各国家和地区对产权交易门槛的降低。随着现代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产权交易壁垒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消减，全球贸易和跨区电商深化发展的障碍减少，故数字经济的推进也有了更充分的前提条件。

（四）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以外的余值”^{[11]183}，

我们可以根据其展开的相关论述^{[11]183-184} 做出以下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为： $Q=P/I$ （其中 Q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P 表示总产出， I 表示总投入）， P 值的增加则意味着经济的总体增长， I 值的增加则代表着投入的整体增长， I 包含资本等有形生产要素，但并不包含技术进步等无形生产要素，我们根据公式提出，假设在有形生产要素总投入 I 值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等无形生产要素的发展，而引发总产出 P 值从原来的 100 单位增长到 200 单位，全要素生产率 Q 值从原来的 m 增长到 n ，则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增长。

由于数字经济高度依赖当代信息技术，而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的关系很密切，可知数字经济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也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根据《世界经济年鉴 2017》的数据^[12]（参见表 2），全要素生产率（TFP）长期保持较快增速的是中国，2006-2010 年均值高达 3.8 个百分点，其他年份也在 2.4 个百分点的高位上下徘徊。这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和数字经济推进的趋势等都是高度契合的，而美国的表现则相对稳定，其他国家之间差异显著。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厂商不断完善生产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普遍上升，即技术层面进步越来越显著。经济社会技术层面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使我国各行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包括跨区电商在内的各大行业自身纵深推进的同时，其所依托的物流行业、信用经济和全球贸易等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实效性的进步，这种趋势也引致了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越快，跨区电商、信用经济和全球贸易发展也会加速，数字经济受到的正向冲击也更大。

表2 G20经济体中部分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						
国别	2006—2010均值	2011—2015均值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国	3.8	2.5	2.6	2.5	2.4	2.4
美国	0.0	0.1	-0.1	0.2	0.1	-0.3
日本	-0.5	0.3	1.6	-0.6	0.2	0.0
德国	-0.2	0.5	0.1	0.7	0.6	0.9
英国	-0.7	0.1	-0.1	0.5	0.3	0.4
法国	-0.7	-0.2	-0.2	-0.1	0.0	0.1
意大利	-1.1	-0.3	-0.3	0.1	0.2	-0.2
印度	2.5	1.5	1.6	2.2	2.8	3.3
俄罗斯	2.7	0.9	1.0	0.2	-3.2	0.2
加拿大	-0.9	0.1	0.5	1.1	-0.9	0.0

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诫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要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必须指出，这对我们充分理解当代数字经济及其双刃剑作用而言则显得非常中肯。数字经济作为新出现的事物，在发展初期就展现出极强的生命活力和发展潜力，深刻地展现了自身的积极性质。

（一）促使全球经济提质增效

首先，当代数字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再生产效率不断提升，推动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有效提高。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模式相比较，最为突出的战略优势就是其提升了社会再生产诸多环节的效率，居于首位的就是生产环节的效率。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环节中，生产厂商同时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他们需要生产出商品并供市场做出选择，但同时他们还要从外界购买原材料、二次加工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者依托数字经济，能够更加便利地从纷繁复杂的市场中购买到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二次加工材料和劳动力等，并且精准地生产出能够被市场广泛接受的商品，进而实现生产环节效率的持续攀升。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27066132001006102>